

澳大利亚、中国 and 美国的三角关系

Richard. Rosecramce 著 吴荫东 译

原载 *Austrac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0.No.s

1. 前言

当奥托·冯·俾斯麦被推荐给试图成为整个欧洲联盟“三巨头”的奥匈帝国时，他了解这个次要大国的地位。在安德拉希伯爵的推进下，维也纳基本达到目的了——成了三皇联盟和三国同盟的成员。其唯一的违反行为就是在 1879 年加入两国同盟，这个错误在两年后被纠正了。

这种情况是怎么和澳大利亚扯上关系的呢？澳大利亚不是东盟成员，虽然他参加包括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内的东亚高峰会议。美国则不是该会议的成员。澳大利亚也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参与者。美国和加拿大也参加了该组织。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但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与日本和中国很少有外交上的联系，因为澳大利亚被这两个国家看成是西方在亚洲的前哨基地。这种情况在基廷任总理期间（其时澳大利亚寻求与印度尼西亚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稍后受到澳大利亚支持东帝汶独立的考验），得到一定程度的补救。而在约翰·霍华德任总理时则走得更远，霍华德与北京逐渐建立起新的联系，这一切只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强。

在过去，以及在冷战期间，太平洋地区基本上是一种两极的安排。而部份中立主义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同泰国和菲律宾一起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减轻了这种情况。就最乐观的一方面看，亚洲各国在两极阵营间徘徊，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不是亚洲国家的澳大利亚总是采取亲西方的态度，批评苏联和中国两国。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澳大利亚违背了俾斯麦的权威定论。这个战略方向现在或许要结束了。

2. 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的三角关系

目前存在着确定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作用的三个至关重要的三角关系。第一个是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第二个是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第三个是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在第三个三角关系中，美国将试图坚决地把日本拉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会在巩固与东京的进一步友好中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些成功体现在防卫上，在导弹防御上，而且在经济上多少也有一点，虽然日本仍拒绝美国“经济开放”的主张，而且不接受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美国试图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将澳大利亚带进这种新的美日结盟。不可避免的，这种友好关系往往有反华的性质。

3. 澳大利亚、中国、美国的三角关系

另一个三角关系（即第一个三角关系）是澳大利亚、中国 and 美国的三角关系。如果澳大

利亚确定不希望置身于两极的反华结盟中,他就必须找到保证第三个三角关系的结果确实不会影响到第一个三角关系的结果的方法。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铝矾土和铀的销售对双方都是日益重要的。在某些方面,澳大利亚已变成世界原料的重要来源,就象中东一直是石油的来源一样。因此堪培拉拥有能为其在大国俱乐部中提供更大影响的经济力量。

外交部长唐纳对美国副国卿阿米蒂奇提出的答应在大陆挑起台海危机时参加帮助保护台湾的要求犹豫不决。澳大利亚不想在这件事上“插一脚”。但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澳大利亚在满足美国的要求上会走多远。通过经济上的联系北京在抵消新加坡和泰国的反对上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而且在北京的抚慰下吉隆坡和马尼拉马上就要改变态度。韩国已同美国渐渐远,因为与北朝鲜统一的前景已浮现出更现实的可能性。日本是东亚尚存的反华情绪堡垒,而支持这一立场的压力将施加到堪培拉身上。

4. 澳大利亚、中国、日本的三角关系

在这三个三角关系中,最具经济色彩的第二个三角关系可以被用来避免上面提到的结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日本与中国为获得澳大利亚的原材料和天然气而相互竞争。而且,日本必须在中国销售,此外,日本在中国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以便于在亚洲其它市场销售。中国重视日本的技术并接受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已变成日益重要的了。对澳大利亚而言,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三角关系,因为它使这三个国家能够聚焦于他们的经济互补,并减少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其它范围的政治紧张。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将逐渐了解堪培拉优先考虑与北京良好的贸易关系。换言之,第三个三角关系能够帮助解除第二个三角关系中的二极压力,并让澳大利亚在第一个三角关系中能够移动到独立的地位。在第一个三角关系(澳大利亚、中国、美国)中,澳大利亚可以同可能变成敌人的双方保持友好。

亨利·基辛格是第一个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寻求俾斯麦式解决方法的当代政治家。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关系中,当中苏关系在1969年恶化的时候,他试图与中苏双方保持很好的关系。中国和苏联都不知道在摊牌时美国会站在哪一边。至少用分析的推辞来表示,这种不确定促进了稳定。苏联完全不会攻击中国的核力量。“缓和”的第一阶段出现在尼克松政府打“中国牌”之后。当然,这张牌不只是其中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它提高了万一苏军往西调动时中国武装力量动员的可能性。在1974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施莱辛格把中国设想成是西方防卫的一个“分析的要素”。在这个新的大国核心中,记住尼克松和基辛格并未试图利用中国对付中国(?)是重要的:他们希望与中国和苏联保持友好的关系,就象澳大利亚目前在其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上所做的那样。

5. 澳大利亚和大国的和谐

俾斯麦是1871至1890年间大国关系的关键,但他从未使全面的欧洲和谐再现。法国总是受到忽视,即使俾斯麦在1872-1884年支持法国的殖民地野心的时候也是如此。俾斯麦德国的关键是防止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对英格兰示好使法国孤立,防止奥斯曼王朝因欧洲和平的瓦解而衰败。在更早的时候,奥地利总理梅特涅是唯一成功地把五大国

团结在和谐机制中的德国人，他是通过不做得太多和确保两翼国家——在东边的俄罗斯和在西边的英格兰——相处得还可以而获得成功的，而只要中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被遏制，这是可能的。如果中欧出现社会和政治革命，英格兰会支持这场革命，而俄罗斯亦会进行干预以镇压这场革命。这的确是 1848 年后所发生的，在此之前奥地利在俄罗斯和普鲁士的支持下勉强维持着岌岌可危的生存。普鲁士和俄罗斯不会直接遏制法国，因为英格兰就在一边使法国的对外阴谋不至于刺痛别人。通过与更强的邻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奥地利凭外交手腕和政治手腕生存下来。直到 1848 年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的出现，奥地利靠着与巴黎和伦敦的良好关系而存在。在此之前，如果需要的话，奥地利可以指望俄罗斯和英格兰遏制法国，而在 1930-32 年则可依靠比利时。这意味着奥地利得做得更少。

这并不表明澳大利亚可以变成梅特涅的奥地利或俾斯麦的普鲁士并起着相同的作用。当今的世界和谐应包括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抗衡的，即使在缺乏和谐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西方，美国受到欧洲和俄罗斯的束缚；在东方，印度和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而这种发言权在时间的推移中还会增加。只有日本仍然是美国忠诚的盟友。但限制美国的力量也包围着其它国家。中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经济上的同事。即使没有美国，北京亦会因日本和印度的存在而受到限制。欧洲是不会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而俄罗斯的支持显然是靠不住的，尽管有上海合作组织协议。

那澳大利亚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澳大利亚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对话者和中间人。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是亚洲的，但在种族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尽管在时间推移中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同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一样的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的兴趣。重要的原材料的生产者对消费国经常是有影响力的，而对澳大利亚而言，这包括了欧洲和日本。许多国家希望与堪培拉有良好的关系，因为石油并非是世界范围唯一需要的资源。比较起来，美国是个消费国，而不再是主要的矿物、天然气和石油的生产者和出口者。加拿大和拉丁美洲支持澳大利亚的作用，但美国确实没有这么做。对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而言，较大的经济优势正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6. 澳大利亚与中国

奥地利发现在即将来临的争吵中防备英格兰和俄罗斯是非常重要的。奥地利及其普鲁士盟友有助于遏制法国，伦敦亦然，这是个相互渴望的结果。甚至奥斯曼帝国在英格兰和俄罗斯之间不产生巨大的麻烦，只要“高门”能够保持住日衰的大国地位。目前在相似条件下，堪培拉希望确信北京和华盛顿不会打起来。这完全没有必然性。19 世纪欧洲的反动政府不是最终注定要垮台的。在经济方面，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这表明澳大利亚应该力争支持能使三个国家和解接近的三方制度，而且不能不管目前过时的两极模式，根据该模式日本和美国要求澳大利亚反对中国。让中国在太平洋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有关各方是有好处的，而且这有利于澳大利亚在美中之间渐增的中间地位，成为双方的朋友。堪培拉与日本的会合能够平衡其与中国的会合。澳大利亚正日益起着“三巨头”的作用。

然而，澳大利亚应该成为中国的助手是不能接受的。经济上的联系、甚至是经济上的满足，并没有转变成中国给人在政治上的满足。这部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对世界经济甚至对国际关系来说通常是不彻底的。要求中国变成“利害关系者”并因此获得进入世

界最高级会议的途径。“利害关系者”这个看法有一个规范的性质，它表现各国是通过努力支持现有体制的标准，而不是在利益显示出与这些标准背道而驰时就忽视这些标准来赢得这个资格的。中国在其对苏丹的资助上，在其一心一意地在中国、非洲和拉西美洲(?)寻求石油和原料上，都一直是不管这些标准的。而国(?)与伊朗的联系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都是草率的。有时，道德和政治会控制经济推动力。当然不能指望中国在整个发展中世界支持和传播民主，但从任何标准看，有些体制会比其它的体制更好。在以前的南朝鲜和巴西实行的现代技术专家治国制解除这些专治政权的一些政治暴行。津巴布韦在实现现代化上的失败并没有使在那里进行的所谓“民主”选举合法。

澳大利亚在这些方面是一个好导师。堪培拉明白不受约束的政治确实不会总是产生有益的结果。所罗门群岛、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了这个认识的证明。在教育或最低收入标准尚缺的地方，民主的前景是苍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的“试验”不能尝试。香港的政治体制就是这种“试验”之一，而且不论在西方或中国看来，这个试验没有失败。不过还应该进行其它的试验。

7. 结 语

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澳大利亚需要在外交平等的基础上在东亚创造并加入把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集合起来的三方机构。通过 APEC，这点非正式地做到了。澳大利亚在东亚峰会的成员资格给了堪培拉在亚洲有了目前一直拒绝给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试图重建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澳大利亚应有计划地与中国的非正式会议加以弥补。

欧洲和谐的历史表明五方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非正式的联系而得到促进的：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为一方，英格兰和法国为另一方。然而，奥地利提供了胶合英国—俄罗斯的粘剂。目前，澳大利亚必须帮助为美国和中国提供这种胶合。日本和印度是不会促进这个进程的。欧盟或许会帮助，但它在地理上是遥远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置身于谈判之外，而且，不管怎样，它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都是脆弱的。澳大利亚是极少数与北京和华盛顿都有友好关系的主要国家之一，它应该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去不断增加影响。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图书馆

邮政编码：361005